

本专著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实证分析的汉日空间表达方式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2YJA740083）的资助。

空间与认知

——汉日惯用语对比

徐靖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专著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实证分析的汉日空间表达方式对比研究”（项目编号：12YJA740083）的资助。

空间与认知

——汉日惯用语对比

徐靖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与认知:汉日惯用语对比/徐靖著. —西安: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8(2017.4重印)
ISBN 978-7-5605-6247-6

I. ①空… II. ①徐… III. ①社会习惯语-对比研究-
汉语、日语 IV. ①H136.4 ②H3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3359 号

书 名 空间与认知——汉日惯用语对比
著 者 徐 靖
责任编辑 雒海宁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449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6247-6
定 价 1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525 (029)82664953

读者信箱:xjtu_rw@163.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1章 惯用语研究综述	(1)
1.1 什么是惯用语	(1)
1.2 汉语惯用语研究综述	(2)
1.3 日语惯用语研究综述	(10)
1.4 汉日惯用语对比研究综述	(14)
本章参考文献	(17)
第2章 方所词和方所惯用语	(20)
2.1 方所词研究综述	(20)
2.2 方所词的界定	(25)
2.3 日语方所惯用语	(26)
2.4 汉语方所惯用语	(36)
本章参考文献	(51)
第3章 方所惯用语的认知投射	(53)
3.1 概念隐喻、概念转喻	(53)
3.2 概念转喻与方所表达方式	(55)
3.3 概念隐喻与方所表达方式	(56)
3.4 惯用语与棱柱形模式	(57)
3.5 汉语方所惯用语的认知投射	(60)
3.6 日语方所惯用语的认知投射	(68)
本章参考文献	(75)

第4章 汉日方所惯用语对比	(78)
4.1 日语方所惯用语的汉译考察	(78)
4.2 汉语方所惯用语的日译考察	(121)
4.3 汉日方所惯用语的对应关系	(157)
本章参考文献	(161)
第5章 认知激活的动因	(162)
5.1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162)
5.2 规约性与认知激活	(164)
5.2.1 文化、社会规约与日、汉惯用语	(164)
5.2.2 生活、习俗规约与日、汉惯用语	(172)
5.2.3 历史、典故规约与日、汉惯用语	(186)
5.2.4 宗教、思想规约与日、汉惯用语	(197)
5.3 惯用语教学对策	(200)
5.3.1 利用共识文化促进正迁移	(200)
5.3.2 认识文化的不同性,防止跨文化冲突	(201)
5.3.3 理解文化的不对称性,突破跨文化困境	(201)
本章参考文献	(203)
本书参考辞典	(204)
语料库	(204)
附录一 『中日辞典』中的汉语惯用语及其日译	(205)
附录二 日本語場所空間の慣用句	(216)
附录三 《中国惯用语大辞典(辞海版)》收录方所惯用语	(247)

第1章 惯用语研究综述

1.1 什么是惯用语

汉语和日语都有丰富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这也是汉语和日语共通的语言魅力之一。

汉语中的“习语”和日语中的「成句」,都既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又是语言浓缩沉淀的精华,它们无论从语言的结构形式还是语义内涵上,都有很多相似、相关之处。

汉语的习语,一般指语言中固定的词语或语句,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习语通常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格言、俗语、俚语、行话等,其表现形式音节优美,音律和谐,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或典雅端庄,或幽默含蓄,妙趣横生,是语言美的重要体现。汉语的习语不仅是表现在语言层面的智慧精粹,它还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内涵。

关于日语中的「成句」,其释义如下:

「①慣用句のこと。「顔が広い」「足を洗う」など。②古くから広く世間で習慣的に用いられるひとまとまりの言葉。「猿も木から落ちる」「時は金なり」などのことわざや格言の類。成語」(『大辞泉』);

「①古人の作った詩文の句で、よく知られているもの。「人間至る所青山あり」の類。②習慣的に固定している句。秋の形容の「天高く馬肥ゆる候」の類」(『広辞苑』(第四版))。

上述「成句」释义,可概括为三点,一是自古以来就众所周知且被广泛使用;二是由复数词语构成,结构相对固定;三是主要包括惯用语、谚语、典故成语、诗句等。

汉语“习语”和日语「成句」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奠定了对比研究的基础,剖析二者的异同原因,也是汉日对比语言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

汉语和日语的“惯用语”均处于汉语“习语”和日语「成句」的下位范畴。虽然长期以来学界在汉语惯用语的外延界定上存在争议,但是对其概念内涵的阐述却基本一致。惯用语的定义如下:

“熟语的一种,常以口语色彩较浓的固定词组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多用其比喻

意义,如‘开夜车,扯后腿,卖关子’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由定型词组构成的一组熟语,已超越字面含义,而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木三分的表现力,如半瓶醋、戴高帽、鬼画符、马大哈等等”(《应用汉语词典》);

“口语中一种相沿习用的定型短语。形式多为三个音节,语义多为比喻义或引申义。如‘碰钉子’‘吹牛皮’‘打马虎眼’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以上定义均涵盖了惯用语的三个基本特点,“一、它的语义具有双层性,除字面的语义外,必须具有深层次的比喻引申意义;二、它的结构是固定的;三、在句法功能上它同成语近似,在修辞功能上它有强烈的通俗性和口语色彩”(李行健 2002)。

日语“惯用语”的释义如下:

「いつも二つ以上の単語が一続きに、または相応じて用いられ、その結合が全体として、ある固定した意味を表すものを指す」(『国語学大辞典』);

「二つ以上の単語や語句の結びつきに、ある固定した意味を表すものをさす」(『日本文法大辞典』);

「二つ以上の語から構成され、句全体の意味が個々の語の元来の意味からは決まらないような慣用的表現」(由两个以上单词构成的,词组整体的语义不能由每个单词本身的语义而决定的惯用表达方式^①)(『広辞苑』(第五版));

「単語の二つ以上の連結体であって、その結びつきが比較的固く、全体で決まった意味を持つ言葉だ」(由两个以上单词组成,结构比较固定,其整体拥有特定语义)(宫地裕 1982);

「二つ以上の連結使用が固定しており、全体の意味は構成語の意味の総合からは出てこないもの」(是两个以上单词的连接使用并且固定化的形式,其整体的语义并非各组成单词的语义总和)(国広哲弥 1985);

「いくつかの語からなる句で、語の結びつきが固定し、句全体の表す意味が特殊化したものを、慣用句という」(惯用语指由复数词汇构成的结构相对固定且具有特殊语义的短语)(益岡隆志、田窪行則 1992)。

综上所述,日语惯用语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由两个以上单词组成,二是其结构形式相对固定,三是其语义并非是所组成单词语义的总和,而是整体拥有特定的语义。

对比汉日惯用语的释义和特征,可以发现二者无论是在结构还是语义上,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1.2 汉语惯用语研究综述

虽然汉语的惯用语自古有之,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据可查,如“耳边风”(唐·杜荀

^① 日语文献中的定义和概念,均为笔者翻译。

鹤《赠题兜率寺闲上人院》)、“抱粗腿”(元·高文秀《浣范叔》)、“下马威”(明末清初·李渔《蜃中楼·抗姻》)、“不管三七二十一”(明·冯梦龙《醒世恒言·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但是惯用语这一语言形式直到近现代才逐渐丰富并蓬勃发展起来。20世纪50年代以后,惯用语作为一个区别于成语、谚语、歇后语的新的熟语类别被确定下来。^①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对惯用语形式结构和性质特征以及其外延界定的研究,成为了语言学界的热门课题。

• 杨欣安(1979)

杨欣安(1979)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惯用语问题,一是当时教材中对惯用语的描述和举例存在的问题;二是对惯用语特点的分析;三是讨论惯用语和其他熟语类别的差异。

作为早期研究惯用语的专论,杨欣安(1979)探讨了惯用语的定义内涵和外延、惯用语的结构形式和意义特征以及与其他熟语的区别联系等问题。但是其中有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如判定只有动宾结构的词组属于惯用语的根据是什么?有些二字格词语(如吹牛、吃醋、加油)到底属于惯用语还是词汇?如果说“吹牛”是“吹牛皮”的简略说法,那么“吃醋”和“加油”源自哪些短语?

• 侯新才(1980)

侯新才(1980)指出,“惯用语是一般人所熟悉和经常使用的固定词组,常常作为完整的意义单位来运用”(侯新才 1980:59);侯新才(1980)概括了惯用语的四个特点,指出惯用语的意义往往不是字面意义,而是经过引申发挥或转移了的意义;分析了惯用语的来源,如由方言演变而来、生活事件移作它用等。但是,侯新才(1980)将一些政策法规和政治运动口号(如打老虎、创三好、搞四化)定义为惯用语,和惯用语的一般定义有出入。

• 沈孟璆(1982)

沈孟璆(1982)较全面地探讨了惯用语的结构特点、惯用语的意义特征、惯用语与其他熟语的区别和惯用语的修辞特点。特别是沈孟璆(1982)关于惯用语修辞特点的阐述,如语言经济、凝练、简洁;通俗晓畅、富有生活气息;幽默、风趣、犀利,常带嘲讽、揶揄的感情色彩等,是在先行研究基础上的较全面的概括和论述。

但是,沈孟璆(1982)认为“吹牛皮”这样的惯用语是“专门为比喻义而创造出来的固定词组”,“它的词与词组合不合常理,全凭想象虚拟组合起来”(沈孟璆 1982:

^① 汉语的“熟语”是“语言中固定的词语或语句。使用时一般不能任意改变其组织,且要以其整体来理解语义。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辞海》2010)。

26)。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详见侯新才(1980:60—61)。

• 崔奉春(1980)

崔奉春(1980)主要从内容和结构方面对惯用语进行了分类。该文中对于“比喻”和“夸张”在惯用语含义中的界定以及二者是否存在交集,尚待进一步论证。

• 王勤(1982)

王勤(1982)明确了惯用语属于“熟语”范畴,是人民群众习用已久、定型定义、口语性极强的短小的固定词组;从结构、语义和语言风格三个方面区别了惯用语和成语的性质和特征;指出惯用语的意义不是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新的整体意义;概括了惯用语的构成形式;归纳了惯用语存在5种变型形式。王勤(1982)较全面地定义和定位了惯用语在词汇语句系统中的位置。但是,对惯用语整体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未作进一步论述。

• 施宝义、姜林森、潘玉江(1982)

施宝义等(1982)在概括了惯用语的结构、特征以及与其他熟语的区别的基础上,对惯用语的来源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和分类,如以人、物、自然现象作比喻;从行业语演变而来;来源于历史事件或传说;来源于谚语或歇后语的省略;来自外来语;来自方言等。另外,指出了惯用语推陈出新的过程,这也为惯用语的历时研究作了初步铺垫。

• 袁本良(1986)

袁本良(1986)的研究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指出对于惯用语性质的分析,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比喻义而忽略了借代义;二是对先行研究(王勤1982、施宝义等1982)提出了质疑。袁本良(1986)指出比喻义和借代义都属于引申义,确认了三个概念的种属关系;同时,对先行研究的批判继承,对不断推动惯用语问题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 施宝义(1987)

施宝义(1987)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较全面地介绍了汉语惯用语这一语言形式,承袭了以往研究关于惯用语语法结构的四种类型及其特征的分析,特别提到部分动宾结构惯用语的词汇化和偏正结构惯用语的使用问题。但是,对于所谓紧缩形式的词汇是否来源于惯用语的问题,以及“吃闭门羹”、“走回头路”等,是看作惯用语的扩展形式还是动宾结构的四字格惯用语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论证。

• 张清常(1993)

张清常(1993)针对当时的几部惯用语词典,提出了惯用语条目收入的标准问

题。另外,该文对“惯用语”这一取名不赞同,提议把惯用语叫做习语或习用语。认为“惯用语”这个名称是对早期苏联语言学相关术语的误译,而俄语中的相关概念内涵包括成语、谚语、俗语和名言等,应译成熟语。

• 周荐(1998)

周荐(1998)通过对“穿小鞋”类三字格与双字格、四字格单位的比较,指出“穿小鞋”类三字格不应因其意义的比喻性而被视为惯用语,“惯用语”应是非三字格的一部分俗语。周荐(1998)还指出,“多义三字格既是词又是语,在字面义上是词,在非字面义上是惯用语。但是,这样的解释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语言中并不存在亦词亦语的情况”(周荐 1998:135)。本文认为,当三字格单位出现在一定的语境中时,它到底是字面义还是引申义,就一目了然了,不存在在一种语境中字面义和引申义同时存在的情况,即不存在亦词亦语或非词非语的情况。

• 王泽鹏(1998)

王泽鹏(1998)对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中期发表的有关惯用语的专论 20 余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语义和形式、功能及风格等方面汇总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并提出了相关见解。王泽鹏(1998)认为,语义的变异性还不足以用来判定惯用语,因为许多成语也具有这种特征;词语的多种意义(包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完全可以固定在语言中,是稳妥地存在的,语言中具有双层语义的固定语,其数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可以把握的;另外,利用口语性和书面语性来区分惯用语和成语的方法不妥,因为有些成语词典中收录的成语也带有口语色彩。

• 王君明、陈永明(1998)

随着惯用语研究的不断发展,研究范围和视角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惯用语的语义。王君明、陈永明(1998)主要介绍了 Gibbs 关于惯用语研究的成果,另外还介绍了惯用语意义激活的不同观点,包括字面意义优先模型、平行加工模型、比喻意义优先模型和交互作用模型。王君明、陈永明(1998)对西方语言心理学界在惯用语研究方面的介绍,为汉语惯用语的认知语义研究做了铺垫和准备。

• 余贤君、王莉、刘伟、张必隐(1998)

余贤君等(1998)利用实验分析的方法,讨论汉语惯用语理解的心理机制,证明了汉语惯用语是以节点的形式储存在心理辞典中,惯用语的理解是一个构造过程。余贤君等(1998)是一批较早的通过心理实验方法,将西方语言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在

汉语惯用语中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

• 余贤君、吴建民(2000)

余贤君、吴建民(2000)主要介绍了西方语言心理学界关于惯用语比喻意义理解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指出对不同理解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是造成理论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另外,通过对汉语惯用语灵活性的分析,证明了惯用语的组成成分对惯用语的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 李行健(2002)

在惯用语研究、惯用语词典编纂逐渐成为语言学热门课题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上的争议和词典编纂的规范问题。李行健(2002)主要针对上述问题,从惯用语的主要特点、双层语义关系的分类、修辞特点和如何规范词典编纂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述。

• 刘正光、周红民(2002)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对惯用语的研究也在以往语言心理学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入。刘正光、周红民(2002)主要介绍了西方认知语言学在惯用语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隐喻、转喻和约定知识构成惯用语意义生成的认知基础;惯用语的构造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过程,因而惯用语的意义是有理可依据的、可分解和可分析的;惯用语在意义生成过程中,概念结构的转换会导致框架的修改,而产生惯用语的实际意义。刘正光、周红民(2002)进一步指出了认知语言学在解释惯用语的生成与理解中存在的不足,一是将惯用语的任意性排除的结果,导致了一部分惯用语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二是其经验主义认识论无法涵盖所有语言事实;三是尚未得到充分证据证明概念结构和惯用语生成之间的关系。

• 刘正光(2004)

刘正光(2004)介绍了传统语言学派和认知语言学派在惯用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上所存在的争议。传统语言学派认为,惯用语的意义是整体检索的,惯用语的构成项(单词)的意义对惯用语的整体意义没有贡献,也不影响对其直接理解,即惯用语的不可分解性和惯用语意义的任意性;认知语言学派认为,惯用语的构成项的意义对整个惯用语的意义有贡献,在语义和语法上具有可分析性和可分解性。

刘正光(2004)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无法充分说明复杂的惯用语的全貌,认为惯用语本身可同时拥有任意性和分解性的双重特点,应看作是一个连续体,连续体的两端分别是非分解的和完全可分解的,即从任意性到分解性的连续体,约定性是普遍的,任意性是部分的,分解性是局部的。

• 李艳萍(2004)

李艳萍(2004)主要对惯用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价值进行了分析和论述,指出惯用语的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反映汉族历史、反映汉族民俗、反映汉语言文字情况、反映汉民族语用心理、反映汉民族文学。

该研究对惯用语和民族文化的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文章中也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惯用语的范围界定模糊,认为“你好”、“对不起”等日常礼貌用语也属于惯用语;二是没有严格区分惯用语和词汇,如将“西施”、“闭眼”看作惯用语;三是没有严格区分成语、谚语和惯用语,如将“八抬大轿”、“炎黄子孙”、“无事不登三宝殿”误作惯用语;^①四是有些固定词组使用的时间和空间都还有限,是否能看作惯用语还需进一步考量,如“见马克思”。

• 池挺钦(2004)

在传统语言学关注惯用语的结构特征和修辞特征,认知语言学关注惯用语语义生成机制的大背景下,探讨惯用语形式结构的动因这一课题,其研究视角新颖,意义深刻。

池挺钦(2004)主要分析了决定三字格惯用语稳定性的原因,指出在双音化强大的类化作用下,绝大多数三音节惯用语能够保持稳定性,是因为在构成“1+2”或“2+1”的格式中,“1”基本上是高频使用的单音节,“2”是双音化造成的稳定的、语义清晰单纯的双音节。两者的稳定性共同促进了三音节惯用语的稳定性。此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 陈明芳(2006)

陈明芳(2006)介绍了 Lakoff & Johnson(1980:35)的观点,即惯用语至少是在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规约常识这三种认知机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探讨了惯用语隐喻意义形成中的可分析性、多样性、矛盾性和临时性等特征。

• 王进(2006)

在认知语言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语言学界也逐渐开始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惯用语。王进(2006)主要运用西方体验哲学理论,分析汉语惯用语隐喻的创造性及语境的促动功能。王进(2006)指出,在汉语惯用语中,隐喻不仅产生于相似性,也能够创造相似性。根植于体验方法论的汉语话者的隐喻性思维方式使得汉语中比喻方式优于演绎方式,在现象上反映出大量的只出现喻体不出现

^① “八抬大轿”、“炎黄子孙”收录在《汉语成语大全(大字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P22、P1723;“无事不登三宝殿”收录在《中国谚语大辞典(辞海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P1050。

本体的惯用语,如“替罪羊”、“大锅饭”等;另外,语用环境促动隐喻的形成和理解。

• 吴建生(2007)

在惯用语研究和词典编纂迅速发展的 20 余年中,关于惯用语的界定和词典收目的争议从未停止过,这给惯用语的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利影响。吴建生(2007)在整理各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把惯用语纳入“语”的范畴,在承认其词组性、相对固定性以及口语性的同时,用形式上的“非‘二二相承’”和语义上的“描述性”作为惯用语界定的重要标准。

界定标准的确立,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分歧和争议,为惯用语研究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创造了条件。

• 王岩(2007)

王岩(2007)主要探讨了熟语的审美功能和语用意义。惯用语属于熟语,因此它具有熟语的某些共性特征。王岩(2007)指出,熟语的审美功能包括节奏美、凝练美、含蓄美、形象美和雅俗美;熟语的语用意义一是便于记忆,便于传递信息和储存信息;二是增加传递信息量,提高言语效果。

• 苏向丽(2008)

在一些学者坚持将惯用语与“词”区分,努力完善惯用语划界标准的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惯用语有着明显的词汇化倾向。苏向丽(2008)对惯用语词汇化的考察结论是,在隐喻机制下,惯用语从短语到词是一个短语特性不断弱化,词的特性不断强化的过程。在三音节惯用语这一原型范畴内部,成员的词汇化程度也不同,偏正式比动宾式更易词汇化。

苏向丽(2008)关于惯用语词汇化的分析结论,其积极意义在于关注到惯用语不同于一般短语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意义的整体性,二是在语法功能上相当于一个词。

但是,其分析中还有两点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否恰当。苏向丽(2008)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选取了有原型性质的三音节惯用语 678 条作为研究对象。文中举例的偏正结构三音节多是词典中标明的名词性词语。将词典中已判定为词语而非惯用语的这类三音节形式作为惯用语并探讨其词汇化问题,是否恰当? 第二,“帮倒忙”、“拉关系”等短语,在文中被视作常规词汇化惯用语,认为其“字面义与实际义接近,字面义可直接反映惯用语的实际意义”(苏向丽 2008:66)。需要确认的是这类惯用语是否具有表面义和引申义的双层语义的问题。

• 王艳芳(2008)

语言是思想的投射,思想又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王艳芳

(2008)分析了汉语惯用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出了汉语惯用语的两大文化特点,一是惯用语是词语中与时代和社会结合最紧密的一类词汇;二是惯用语凝练精确、通俗生动,以含蓄的方式将一个个深刻的含义凝练在三、四个音节里。惯用语所投射的中国文化特征包括民族心理、处事道德、为人原则等。

但是,由于王艳芳(2008)对惯用语的定义不够明确,所以出现了体词性名词(如红娘)和非双层语义短语(如凑热闹)作惯用语示例的情况。

• 马启红(2009)

马启红(2009)从语用学角度进行分析,指出惯用语的语义包括基本意义和交际意义,基本义即其社会的静态意义,包括表层义和深层义;交际意义包括潜语和附加义。潜语是惯用语在交际环境中交际双方共同捕捉的信息语;附加义是惯用语在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共同感知的信息语。

马启红(2009)从言语交际的角度研究惯用语的语用功能,分析视角新颖,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何证明和把握这种理解因人而异的潜语和附加义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 刘锐(2011)

刘锐(2011)主要通过实验的方法,考察了第二语言习得者在语境无、弱、强的条件下对惯用语语义理解的程度。实验结论表明,强语境对正确理解比喻意义惯用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对惯用语辞书在示例的编纂方面提出了三点建议:语境充足、语境体现语法、语境体现语用。

• 蒋苏琴(2011)

国内语言学界在介绍西方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运用其理论实证并进行对比研究。蒋苏琴(2011)的研究结论是,惯用语语块的认知不仅受到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和意象图式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文化生态的影响。

蒋苏琴(2011)认为,惯用语语块既反映语言,也反映文化。语言文化所具有的独特内涵包括不同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心理结构、认知与思维方式。惯用语语块作为语言的生命与灵魂,是该民族语言文化特性和心理结构的集中沉淀与表征。惯用语中的意象图式和隐喻意义往往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和鲜明的独特性。

• 李贵垓(2012)

李贵垓(2012)尝试探讨了隐喻和转喻在汉语惯用语形成中的作用问题。首先,隐喻本身就是以体验为基础,日常的经验使我们在客观事物的概念与所表达的内容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其次,有些惯用语同时既依赖隐喻也依赖转喻,如“唱

白脸”；第三，汉语惯用语中存在四种转喻类型，事件框架转喻、范畴和特征之间的转喻、范畴和成员之间的转喻、容器和内容之间的转喻。

1.3 日语惯用语研究综述

• 桜井(1977)

在日语惯用语研究的初级阶段，对「慣用句」的定义决定了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因此至关重要。桜井(1977)区别了惯用语的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并分析了狭义惯用语的成语条件。

先行研究关于惯用语的阐述既有如「日本で慣用句というのは、二つ以上の単語がいつも一続きに、又は相応じて用いられ、その結合が全体として、ある固定した意味を表すものを指す」(『国語学辞典』永野賢氏執筆)，也有如「二つ以上の単語が、いつも一続きに(または呼応して)用いられ、その句全体としてある固定した意味を表わすもの。一つ一つの単語の意味がわかって、句全体の意味は把握できない」(『三省堂新国語中辞典』)。桜井(1977)将满足前者定义的称为广义惯用语，满足后者定义的称为狭义惯用语。广义惯用语包括「しかたがない」之类的短语，狭义惯用语的典型代表诸如「油を売る」等。

桜井(1977)分析了狭义惯用语的成语条件，从起源来讲，短语整体曾用作比喻，但是现在并无比喻意义；短语并非表示具体的动作、作用，而是着眼于动作、作用及其指标的表层被言语化的结果；构成成分的语义是被限定的、是象征性的、是部分代表整体的，均是狭义惯用语。

• 宫地(1982)

宫地(1982)较全面地研究了日语惯用语，所著『慣用句の意味と用法』一书，通过记述最基本的日语惯用语，尝试探讨其构成的方法。其主要板块包括“惯用语例解”和“惯用语解说”。在“惯用语解说”中，明确了日语惯用语的定义及其系统位置，指出惯用语是“比一般的短语(词组凝结而成的短语)的结合度更高，但是与格言、谚语不同，不表示历史性或社会性价值观”。惯用语又分为“词组短语性惯用语”和“比喻性惯用语”，并进而分析了惯用语的品词性特征、词汇性特征、形式特征和形式制约因素等。

• 国広(1985)

国広(1985)对惯用语的分类方法，至今依然为语言学界所重视和广泛认可。其分类是按照意义、形式和固定用法三个标准。依据意义的分类标准，惯用语可分为不透明语义、比喻语义和文化相关语义三类。不透明语义是指惯用语构成成分的意

义与惯用语整体的意义不清晰,无法判断是比喻还是其他关系,如「あぐらをかく」;比喻语义指既保存了字面的原意,又通过比喻具有了引申意义。有的惯用语字面的原意已不再使用,如「手を焼く」;文化相关语义是指惯用语的整体语义与文化密切相关,如「顎を出す」日语表示“疲惫不堪”,英语“keep your chin up”则表示“准备战斗”之意。

• 王武(1988)

中国日语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日语惯用语的研究。王武(1988)主要从形态上介绍了日语惯用语的几种构成形式,“名词+动词”构成的动词惯用语、“名词+形容词”构成的形容词惯用语、“名词+名词”构成的名词惯用语以及从一般的语法现象或语言逻辑上难以解释的惯用语。

王武(1988)所举示例都给出了汉译,其中有的是用汉语成语对应,有的是用谚语等对应。这对以后的汉日惯用语对比研究具有启迪作用。

• 伊藤(1992)

在惯用语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日语与其他语种的惯用语比较研究也在推进。伊藤(1992)从日英对比的角度,考察了包含数字的惯用语和谚语。

数字和数词是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语言表达形式。数字词的起源有久远的历史。由于东西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所以对数字的吉凶看法上,也有很多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很多投射在了日英惯用语上。

• 益岡、田窪(1992)

益岡、田窪(1992)对惯用语的定义比较客观、全面、清晰,「いくつかの語からなる句で,語の結びつきが固定し,句全体の表す意味が特殊化したものを,慣用句という」,指出惯用语构成成分的语义未直接反映在短语的整体语义上。另外,分析了惯用语的三种结构类型,包括「補足語+述語」「連体修飾語+名詞」「述語を修飾する働きをするタイプ」。另外,益岡、田窪(1992)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惯用语,有「～によれば/よると」「～必要がある/ない」「～ばかりか～も」等。

益岡、田窪(1992)关于惯用语的划界问题,如「音がする」是否属于惯用语,如「～によれば/よると」到底是惯用语还是惯用句型,还需进一步探讨。

• 程長善(1996)

针对不同语言构想和表现的不同,程長善(1996)从汉语母语话者的角度出发,探讨和分析了日语惯用语的语义特征和汉译策略。研究结论包括七个方面,日语惯用语适用范围广,语汇丰富;惯用语组成成分的结合度高,多用比喻;“意译”是翻译

惯用语的关键;惯用语中有一部分易懂且具亲近感的汉语词汇,均可对应汉语中的四字成语;惯用语中还有少数包含外来语的惯用语;身体词汇惯用语是较难掌握的一类;用「气」表示喜怒哀乐等心情的惯用语,汉译时多以“心”对应。

• 松原(1999)

与以往惯用语辞典的分类方法不同,松原(1999)的分类另辟蹊径,具体如下。第一类,没有出处,容易使用 and 理解的俗语和流行语;第二类,有出处的惯用语,如出自中国或日本古典;第三类,与佛教文化有关的惯用语;第四类,与西欧、中东文化有关的惯用语。松原(1999)的分类方法,有助于了解惯用语语源和理解其语义。但是,对于惯用语和俗语、成语、谚语的划界,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 小池等(2003)

小池等(2003)对惯用语进行了核心词品词性分类和修辞分类。小池等(2003)对14个国家的10条惯用语进行了对比考察,研究结论有三点,第一,作为研究对象的10条惯用语,一方面在西方各国间关联紧密,包括共通的表达方式和象征、构思方面诸多的类似之处,而另一方面,东方的惯用语在多样性上比较贫乏,但是表现手法新鲜,而共通性却较低。东方的惯用语更能清晰地反映出各国的文化特征;第二,从惯用语的多寡来看,西方的惯用语数量多于东方;第三,东方各国惯用语的诞生更多地受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惯用语则更多地受到地理环境特征、历史事件及外事活动的影响。

小池等(2003)的贡献在于,初步探讨了东西方惯用语异同的原因,挖掘了文化差异因素。

• 李東一(2006)

李東一(2006)分析了惯用语的否定形式。日语惯用语的特征之一是其采取否定形式较多。一般用否定形式的惯用语,其“强调”的语义最为明显。否定形式的惯用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只用否定形式,另一种是固定用肯定或否定形式。

• 佐藤(2007)

一直以来,日语惯用语辞典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问题,受到普遍关注。佐藤(2007)以5部惯用语辞典为数据源,考察了惯用语收目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惯用语的判断标准较难确立;辞典收目上的出入较大;同一惯用语的异形的判断;基础惯用语条目中存在疏漏等。

佐藤(2007)对惯用语辞典的标准化问题的反思,以及提出的部分编纂处理对策,对完善辞典的编纂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